



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

姚梦桐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⑤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⑤

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

姚梦桐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2

序

*王伯敏教授

美术，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反映。
当它成为昨天或前天的作品时，
今天的学人，以他的慧悟和知识，
去推敲那些美术的艺术价值；
那些美术的历史意义；
那些美术发展的规律；
还让昨天或前天的人说真实的，
曾经说过的话。

然后，在今天的艺术殿堂上
捧出那些过去了的，足以代表当时的美术
作品，并作出公允的论评。
这，
便是美术史家们光荣的、艰巨、而又神圣
的职责……。

诚然是，美术是造型艺术。它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发与成就。在艺术创造上，艺术家们靠着自身的智慧、才能与经验，作出对客观对象的理解与判断，调动艺术的手段，给予形象地高度概括。美术创造有它的时代性，有它自己的规律和风貌，如果美术创造没有个性特点，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艺术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同化的艺术”。艺术将永远是：东方的艺术，不同于西方；亚洲的艺术

术，不同于美洲或澳洲，反之也如此。在亚洲，中国的艺术不同于日本、印度或朝鲜。新加坡的艺术，同样要有新加坡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样，世界艺术才算得上丰富多彩。所以，愈有民族特点的艺术，愈有它的世界意义。正由于各国各民族的艺术，都具有自己的审美要求与它的表现特点。所以东方的艺术，不一定被西方人所尽识；西方的艺术，也不一定被东方人所尽识。尤其当这些作品成为历史时，更不容易被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人民所尽识。但出现这样现象是正常的。在文化领域里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美术史学以及这门学科的美术史家们，能够给各国，各民族的艺术，通过国际上的各种文化交流，有效地予以阐述并沟通，让彼此的人们都获得理解。美术史家的责任之所以重大，之所以被人尊敬，道理也就在于此。

新加坡共和国在亚洲是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国家；新加坡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近年来，姚梦桐先生经过一番努力，就其国家战前华人的美术活动资料，编写成一部具有断代性质的美术专史。这说明新加坡不但有自己的美术家的艺术创造，并对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昨天”，开始有了自己美术史家的“推敲”。姚梦桐对这本书的完成，无异完成一项创业性的奠基工作。我作为新加坡文化界、艺术界的朋友，也作为中国一位美术史研究者，为此感到莫大的欣喜，并表示由衷地庆贺。

美术史这门学科，正在世界上被重视。不少国家的文科或综合性大学开设了美术史课，中国的高等美术学院，还专门成立了美术史系。近三四十年来，各国发表了不少论文，谈到了美术史的对象和范围，美术史的体例和分期，以及美术史本身的研究方法。我与美国、日本、英国及芬兰等国家的美术史家接触中，了解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要尽一切努力运用崭

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挖掘世界美术在发展中的多元内涵与它共同的特殊规律。但是大家也曾冷静地思考过要进行这件有意义的史学工作，还得从各国美术史家对本国、本民族的美术历史加深研究做起。否则，要对世界范围内的美术历史做出正确判断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本世纪以至跨入新的二十一世纪初叶，如果可以作为世界美术史研究的现阶段的话，则在现阶段各国美术史家兢兢业业地系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美术历史，正是符合世界美术史研究的实际要求。所以新加坡美术史家编写这部《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尽管还属于一种草创，甚至在体例上还可以完善，但是，它的编写与出版，意义重大，必将受到新加坡国内外美术史家们的关注。

由于历史的因缘，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尤其密切。我到了新加坡，不少新加坡朋友对我说：“我们是两个国家的公民，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朋友”。我听到了这些话，感到很亲切。在姚先生的这本书中，他提到了许多中国美术界所熟知的画家，如徐悲鸿和刘海粟先生，就我而言，刘海粟先生是我在上海美专读书时的校长；徐悲鸿是我在北平艺专学习时的校长和研究班主任。读到书中记载这些美术界前辈在南洋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岂止心里感到了高兴，思想上还受到了教育。可以预料，姚先生的这部新加坡断代美术专史，将不仅对新加坡的美术教育，美术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韩非于《解老》篇中写到：“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姚梦桐先生成此书，前后整整化了十年时间，朴实无华。笔下没有造作，也无夸张之言，犹如和璧之不饰五彩。作者实事求是，一切让事实说话，也让“昨天或前天的人说真实的，曾经

说过的话”。他的慎严治学，终于使他完成了这部考据详实，条理井然的史书。今该书即将出版，作者嘱我为之序，欣然命笔，未免有不当之处，尚祈达者鉴正。1992年桂花盛开时节于中国浙江美术学院。

*王伯敏教授，浙江台州人。1924年生。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著作宏富，有《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通史》等三十多种编著出版，近又在主编大型美术史论著《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现在是浙江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学博士生导师，并兼杭州画院院长。

后记

近十年来，在学术的领域里，我是一个“拾荒”者。我甘于从尘封已久的书报中撷拾早已被遗忘，甚至被遗弃了的资料。日积月累，裁剪铺叙，便成了这一本集子。目前，新加坡战前美术史的研究工作，依旧是一片空白。拙著的出版，或填充空白于一隅，或抛砖而引玉，殷切地寄望各方同道携手合作，来填补这一个缺憾！

这部集子的完成，王慷鼎博士的一再鼓励，中国美术史家王伯敏教授的序文，水彩画家周璧珊先生为此书设计封面，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林源福先生、出版主任林孝胜先生的关心，林友权兄惠借令先人林学大墨宝，叶钟玲、庄钦永、吕振端博士、邓肇坚诸友好的热心帮助，于此一并表示谢意。

姚梦桐

10.11.1992

谢启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素来积极鼓励会员从事亚洲社会文化等课题的探讨，并通过学报和丛书刊布他们的研究成果。

本会秘书姚梦桐，早在1983年就开始对我国战前华人美术活动产生兴趣。近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搜罗资料和研究。今将发表于报章和学报上的作品略加修订，交由本会出版，归入亚洲研究学会丛书。

本书之出版经费，承蒙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潘三成先生，联合分色私营有限公司和林癸泽先生等的赞助，学会谨此向他们致以万二分之谢意，并希望他们能够继续鼎力支持我会之其他学术活动。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2年11月15日

目录

王伯敏教授序

1942年以前新加坡华人美术史分期刍议	1
杨之爱与新加坡画坛	8
青年励志社主办——新加坡美术展览会	10
何香凝在新加坡	13
高剑父：从新加坡战前(1930—1932)华文日报 所刊载资料看其在海外的美术活动	24
1931年新加坡画坛	29
战前新马美术：从南洋书画社到华人美术研究会	33
华人美术研究会(1936—1941)——新加坡第一个 组织健全的华人美术团体	40
戴隐郎编《南洋商报星期刊·今日艺术》析论	58
南洋美术的摇篮——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 与其他	71
1938年新加坡画坛	81
沈仪彬在新加坡的画展	87
写菊名家翁占秋	90

徐悲鸿：从新加坡战前(1939—1941)华文日报 所刊载资料看其在海外的美术活动	98
雕刻家杜迪希在新加坡	109
司徒乔夫妇在新加坡	112
华人美术研究会编《星洲日报周刊·艺术》 析论	118
只恐灾黎成饿殍，敢将墨汁换仁浆—— 1940年书画联合展	130
王霭多在新加坡的画展	133
施香沱书画义展	138
刘海粟在新加坡	141
杨善深在新加坡的画展	149
徐悲鸿序李媛青萍画集	153
新加坡战前五年(1937—1941)美术活动初探	155
新加坡战前五年(1937—1941)漫画研究	174
画家张汝器	186
画家徐君濂	192
画家戴隐郎	199
后记	

1942年以前新加坡华人 美术史分期刍议

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以后，定新加坡为自由港，欢迎各族人民前来。到了1860年新加坡人口有81,734人，其中华人有50,043人，几乎占全人口的61%。⁽¹⁾早期华人离乡别井，南来新马，多数是为了生活的单身汉。根据一份1934年的调查报告，基于经济因素而漂洋过海者，几乎高达69.95%⁽²⁾他们大多数是劳工，知识水平低落，南来的最大目的就是赚钱，赚了钱，就回乡享受晚年，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

早期新加坡华侨文化低落，可从以下几件事得到证实：

第一位中国驻新加坡的领事左秉隆（任期由1881-1891）及接任的黄遵宪（任期由1891-1894），在他们的任期内，非常关心侨民文化低落的问题，所以有“会贤社”之设，目的在于“劝与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³⁾黄遵宪有“图南社”的创立，寄望“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窃冀数年之后，人材蔚起”。⁽⁴⁾前后两人都以丕振文风为己任。过后由邱菽园（1874-1941）所主持的“丽泽社”（1896），其用意也在于仿“韩愈入潮”，以“洗穷荒之风气”。⁽⁵⁾然而不管是“会贤”、“图南”或“丽泽”的成立都说明了一件事：一般上，早期新加坡华侨的文化水平非常低落。那么文化层面较高的美术，当然就更不必提了。属于商业性质的美术学校，早在1906年已经在新加坡出现。苏彬廷的“画相传习所”专门教授习写“水相、油相、炭相等”，每月

学费15元，7个月毕业。1908年的毕业人数总共8人，包括5名华人和3名西欧人士。⁽⁶⁾

一个社会的美术活动得以发展，首决条件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已经不成问题，此外有相当的文化，再加上有闲情。早期的新加坡，当然有一小部分的人，具备了这种条件。如《叻报》主笔叶季允精于篆刻⁽⁷⁾，《新国民日报》主笔张叔耐擅长书法等，至于才高北斗的邱菽园，诗书画都通。他的《五百石洞天挥麈》就保留了不少精湛的画论以及题画诗，如《孙裴谷画石颜怡园补梅索题》⁽⁸⁾，（作者按：孙裴谷时任教于端蒙学堂）、《自题墨梅立轴》、《学梅一幅并系一绝》⁽⁹⁾。他还出版了《临桂钟西荪太史法书》（绣虹楼丛书卅五种）。这种风雅韵事，只属于少数能书能画的文人，一般的侨民根本是不能也没有闲情。

1927年杨之爱在新加坡举行“留法学生美术展”，当时署名“秦白”者为文深深地感叹本地艺术气氛的沉寂，同时大声疾呼侨民从事精神文化的建设。徐悲鸿是历史的见证人，1939年他在新加坡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十多年前，我来过新加坡，那时的新加坡虽然不象沙漠，也可以说是炎荒，哪里有什么艺术？”⁽¹⁰⁾按徐悲鸿在1939年之前，曾经两度在新加坡逗留过一段日子，那是1925年与1927年，文中“十多年前”不管指的是1925年或1927年，徐悲鸿以敏锐的观察力，给新加坡画坛所下的结论，正是前文一个最好的注解：在1927年之前新加坡画坛是一片寂静。

总的来说，新加坡华人美术的发展，直到1927年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清共”、“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因为这以后南来的文化人是越来越多。

下文我尝试把战前新加坡华人美术史，做出如下的断代，并提出初步看法：

(一)1929—1935萌芽阶段

1929年的“新加坡美术展览会”，是一个重要的起步。这次的画展，不只是“空前”，也是“启后”。新马画家的作品同场展出。参展的画家不多，可是两地联展之风气，由此而开。其后檳城的艺术展览会、嚶嚶艺展，都邀请新加坡画家参展。

1929年《星洲日报》创刊，同年推出《星光》画刊，该刊主编张汝器极力推动漫画。每期的漫画作品大约占四分之一版，除了特约作者的漫画之外，其他的几乎都出自编者之手（张汝器、胡斌、陈升平、徐君濂和林道庵）。艺术气息虽然稀薄，可是在新加坡美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于1907年出版的《中兴日报》，有不少以推翻满清为主题的漫画，然而限于资料，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些漫画是否出自本地画家之手。（见附录）

画人设立画社，从事商业广告兼开课授徒的也不少，如张汝器的“汝器画室”、陈升平的“南洋新闻漫画社”、“陈民生的“民生画室”、柳文才的“乐天画室”、黄尊生与林若舟的“新岛画室”和连爱同的“漫天画社”等。

1931中国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水灾，南洋各地筹赈救灾的呼声响彻云霄。檳城、怡保的画家杨曼生、钟白木联合分别在两地举行筹赈画展⁽¹¹⁾。寓居新加坡的画家却毫无表示，显然画坛的活动力还是很薄弱。

(二)1936—1937发展阶段

新加坡美术活动，熬过漫漫长夜，直到1936年曙光渐露，

一个充满朝气的美术团体、纯美术的副刊、新马画家作品大规模的美展，都发轫于此。

1936年“华人美术研究会”正式成立。这个美术研究会，论人才、论组织，绝对不是成立于萌芽阶段的“南星美术研究会”所能相比的。与会会员，都是科班出身，主要来自中国和法国的美术专科学校。侨居本地的华人画家，开始有了一个组织健全的美术团体；每年一次的大规模画展，也由此而始。由于不少会员出身中国的美术专科学府，所以一些到访的中国画家也多数由他们接待。会员之中，不少任职于本地中小学，他们默默耕耘，撒下一颗颗的艺术种子。

这阶段除了华人美术研究会成立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1937年新加坡美术广告研究会成立。

1937年的“首届马华漫画展”，成功地在新马举行。

1936年《南洋商报》推出《文漫界》，1937年的《今日艺术》，这两个艺术副刊，极力推动本地的漫画与木刻艺术。

圣安得烈学校也自1936年开始，每年举行校际美展，落力培养学生对美术的爱好。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文化人更是接踵南来，其中不少是画家。中国方面，抗战军兴，画家为践国民天职，纷纷南来，把新加坡的美术活动推向高峰。

(三)1938—1941繁盛阶段

这一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成立，给日后的新加坡美术发

展，奠下一个重要的基础。尤其在战后，它培养了无数的美术人才。

这时期中国画家南来新马举行画展很多，毫无例外的，都先在本地举行，然后转移到马来亚各地。这些画家，包括王济远、胡呈祥、张丹农、沈仪彬、徐悲鸿、翁占秋、昆明漫画木刻展、王霭多、李飞鸿以及刘海粟等。他们的到来，给本地的画坛增添了许多生气。多数的画展，学生或者加入招待队伍，或者到场参观，给他们带来了学习的好机会。展览的会所，也集中在中华总商会或维多利亚纪念堂，场面热闹多了。总之，中国的抗战，间接推动了新加坡画坛的前进。

(四)结论

1927年以前新加坡的华人美术活动实在过于枯寂，华人的南来基本上是为了谋生，实在无能力从事艺术活动。1929年一个会员跨越新马两地的美术团体——南洋书画社，宣告成立。当时该社的赞助人与发起人，有鉴于“炎荒”精神生活的苦闷，于是从“普及”的角度去推广本地艺术，实在也是抱着“持续中国文化”的心态。所以灯谜、棋局之类也在他们的会员作品展中出现。1936年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人美术活动，由萌芽时期逐渐转入发展阶段，本地华侨开始有了大规模的美术展览活动。1937年抗战军兴，文化人接踵南来，原有画家的阵容加强了。1938年南来举行筹赈画展的画家，陆续不断，中国的抗战，把本地画坛推进了繁盛期。这一个阶段从1938一直延续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注：

- (1)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1948), P.xi.
- (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 1938), 页48。
- (3) 梁元生《从一份名录看十九世纪华人社会中的士阶级》(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52种)
- (4) 叶钟铃〈黄遵宪与图南社〉, 见新加坡《亚洲文化》第15期, 1991年6月, 页122。
- (5) 姚梦桐〈邱菽园印石〉, 见新加坡《亚洲文化》第7期, 页29。
- (6) 见新加坡《中兴日报》, 1908.2.21
- (7) 见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三, 页十五。
- (8) 见《邱菽园居士诗集初编》卷五, 页四。
- (9) 同注(8)
- (10) 见新加坡《星洲日报》, 1931.11.2
- (11) 见新加坡《星洲日报》, 1931.12.29

附录



《中兴日报》，1907.9.25



《中兴日报》，1907.11.28